

反映民意，對現存體制本身發出議論。」（頁289）這句話是否存在矛盾呢？

張笑川

復旦大學歷史系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By HENRIETTA HARRI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ii, 270pp.**

是什麼使中國人成爲中國人？換句話說，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是中國人？這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2000年出版的《民國市民的形成：1911-1929年間中國的政治典禮與象徵》一書中提出並力圖解答的問題。圍繞本書探討的主題——中國人的身份意識是如何從20世紀早期的變局中產生出來的，著者以1911年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到1929年孫中山葬禮之間的國家典禮與儀式、人們在典禮儀式及日常生活中所採用的各種習俗與象徵爲研究對象，探討20世紀早期的國家典禮與儀式如何發揮把個體歸類進群體的作用，創造出新的政治文化，進而影響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最終產生出新的中國人意識的。沈艾娣承襲Joseph Levenson的觀點，認爲現代的中國人身份意識的產生，是從文化主義向國家主義轉變的過程，意味着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現。而且，此變化是發生在普通人中間的廣闊的文化變遷。關於現代國家主義的產生過程，沈艾娣又吸納了Benedict Anderson關於「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這一理論，認爲國家主義非既存，而是被創造出來的；族群也是如此。而個人既是族群的一份子又是國家的一份子，因此，族群和國家主義就是常常以儀式和典禮的方式把個體歸類進各種群體（包括納入和排除兩個方面）的產物。她認爲，中華民國舉行的各種儀式和典禮，既促成了不同共同體的形成，也促成了不同共同體之間的權力層級的形成，而民國市民就是一個以一系列習俗、象徵爲依據進行身份定性的群體。

第一章「使革命超越政治：辛亥革命與普通人」分析了孫中山、黎元洪、袁世凱先後就任總統的三個就職典禮，並從這三個不同典禮及其地方版本中總結出一些共同元素：剪辮子、穿西裝、新式禮節、採用陽曆改變歷史敘述的面貌、提出領土要求、以職業團體代表的名義參與典禮、女性參與典禮等；其中剪辮子更成爲民國初年影響全國地方的少數政策之一。這些元素從前被歸類爲外族的標誌，現在被民國締造者當作是國家認同的標誌。沈艾

娣認為，在民國肇始的短短幾年裡，這些元素就迅速成為新的政治文化與國家象徵。

第二章「民國市民」分析了民國早期的長袍馬褂、禮帽、「學生裝」等時尚，表明這些時尚已經成為民國市民和官員的標誌性習俗。在這個時期，個人採用新式服飾、禮儀、舉止以標明自己在新的國家共同體（new national community）中的成員身份。民國市民通過這種方法把自己劃分出來，形成了一個可定性的群體。而政府對民國新習俗的確認，也表達出要求重組族群和國家主義組成元素的願望，要求「中國人」身份不再根據與眾不同的舊式服裝、行為方式、生活習慣來定性，相反，中國應該被定性為一個現代國家，其國家身份通過民國市民的現代習俗表現出來。但是，市民這個共同體只是當時個人可能屬於的眾多共同體中的一個，大部份人仍然在繼續着他們自己的屬於其它共同體的習俗和行為。而且，就在反對民國市民的政治要求的過程中，一個相反的關於何為中國人的族群身份認同問題也在民國時期興起，這種身份意識被自認為是傳統的、古老的。

第三章「共和國與國家共同體」探討的是：辛亥革命所產生的一系列國家象徵如何創造了新的國家模式。沈艾娣說，民國早期，作為法制源泉的民主制度經歷了多次破壞，政治演員們便創製了一套看似與政治無關的國家象徵。通過考察民國早期國慶慶典發現，1910年代及1920年代早期的慶典中經常使用到的一系列象徵，比如五色旗、唱國歌、祭奠烈士、口號「民國萬歲」等等，都不具備超越於「反清」、「愛國」的政治意義，在政治內涵的解釋上留下了空白，這使得不同層次的爭權者都可以利用這些象徵來取得自身地位的合法化，也使得個人可以通過跟國家象徵的關聯來宣示自己的市民身份。

在一系列合法化的象徵中，最核心的一點莫過於「人民的參與」，即普通人也應當有權參與國家慶典。在民國初年的國慶慶典中，作為代表前來參加慶典的人，都是學校、商會、農會等職業團體或其它類型的組織掌握之下的，而國慶慶典中用於描繪社會分工的一套詞彙，也以「社會由各種職業部門組成」這一想法為基礎。這表明，民國初年，無論是國慶慶典的組織者還是參加者都不把他們自己放進精英—平民的劃分法裡面，社會按職業進行分工的面貌橫貫（cut across）於精英—平民的劃分法之上。

第四章「英雄，壞人和歷史創造」分析了1925年孫中山的逝世和當年在北平舉行的葬禮，說明「英雄」、「壞人」和「歷史」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在孫中山的逝世及以後的葬禮、紀念活動中，孫中山由一個生前有爭議

的政治家在去世後變成了國父。他的民族英雄形像獲得廣泛接受，表現出一種社會政治理論的架構普及化——這種架構的基礎即是：中國政治形勢由帝國主義、軍閥、革命黨組成的，它使人們對原本複雜的政治、社會、軍事形勢的認識簡單化了。這一架構在1920年代廣泛傳播，最後成為政治運動的有力工具。國民黨對歷史的一套敘述方法也由此形成了，國民黨用帝國主義一軍閥的分析，使自身的地位合法化並贏得支持。這是國民黨最終讓人們普遍理解的近代史的漫長確立過程之一部份。

然而，葬禮參加者的自發、無序狀態，甚至持不同觀點的送葬隊伍並存的情況，以及關於孫中山思想完全不同的多種解釋，表明1927年前的國民黨並不能作為一個統一體進行一體性思考和行動，它在孫中山逝世期間只是吸收和改變了一些國家象徵，還把孫中山本人也吸收為國家的象徵之一。

第五章「市民革命」，講述了北伐期間及以後的時間內國民黨對國家象徵所做的改變。在北伐過程中，國民黨通過選定並推廣新國旗、新國歌等方法，給很多民族象徵灌輸進國民黨自己的意識形態，原來的民國象徵就轉變成為國民黨治下的國家的象徵。在這個過程中，正統地位從作為整體的人民那裡，轉移到了組成國民黨的市民那裡。而北伐則是在把普通人變成市民、把市民變成黨員。

1929年孫中山的葬禮是20年代後期國民黨組織的最大、最重要的儀式。沈艾娣認為，它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考察人們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因此，第六章「孫中山的葬禮和市民的局限」就以1929年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葬禮為研究對象。在葬禮上，外國使節的到場突出地表明國民政府得到了各國承認；到處充滿着國民黨黨旗的紅、藍兩色，表明送葬隊伍演示着一幅圍繞孫中山的、他們自身參與創設的民國的圖景；而蔣介石非常清楚孫中山作為正統化源泉的潛力，自他逝世之時起，國民黨就不斷重複孫中山的思想將在黨內而且只在黨內長存，而他的思想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作為一位民族人物，孫中山已成為國民黨控制內的一個象徵，而民國初期被擬化為虛弱孩子的民國，現在被擬化為一個由黨的化身孫中山引導向上的孩子；治喪委員會由籌委會成員加國民政府各部部長、南京市長組成，則表明治喪組織不再是國民黨的，而是政府的。由此，透過國民黨、國民黨和孫中山的聯繫，國民黨領導人為國民政府尋求到了合法地位。

在這一章裡，沈艾娣還花了很長的篇幅來描寫送葬隊伍的順序，因為她認為這提供了一個機會去理解國民黨中國的一個主要構件：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模式。葬禮對參加者的順序安排，表面上承襲了民初把社會按職業進

行分類的做法，事實上卻進行了巧妙的篡改：不僅參加葬禮隊列的團組和部門歸附於國民黨，而且來自各團組的葬禮參加者個人也都由黨的地方組織推薦，以保證只有歸順國民黨領導的人才能參加。葬禮所體現出來的國民黨視野內的社會，是國民黨下面的組團的層級。而當社會被看成是國民黨領導下的群體時，社會劃分的實質就更像清代「官—民」的劃分法了，即黨和政府為官，普羅大眾為民。與此同時，普羅大眾就被排除出了葬禮之外。又由於對葬禮只允許有唯一的解釋，葬禮的意義已由治喪委員會的宣傳口徑、出版業的慶祝冊子事先定調，獨立個體也就因此被排除在外。總之，在1929年的葬禮上，我們看到了對革命象徵的解釋是如何被納入國民黨中國的架構的。

沈艾娣在「結論」強調了政治力量在文化創造中的重要性。她認為，民國早期興起的中國國家認同感，是政治結構和政治力量的產物，之後，它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接着是中國大部份人的身份認同。最後她說，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不是因為他們參與了傳統的出生、死亡、結婚禮儀，而是因為他們參加了現代的國家儀式。

沈艾娣的研究向我們展示了中華民國的市民意識是如何透過各種典禮、儀式、習俗而形成的，又如何透過組織儀式、推行象徵的行動而被國民黨納入其凌駕於民眾之上的國家架構之內。這對研究民國初年普羅大眾的觀念變遷、研究國民黨逐漸掌權的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一個以典禮和儀式為切入點的，而非「傳統—現代」的、軍事與政治鬥爭的視角。細讀本書，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邏輯鏈：民國市民意識的產生，意味着中國人的意識由文化主義向現代國家主義過渡；而族群和國家主義的形成，往往是儀式和典禮對個體進行歸類的產物，因此民國市民就是以一系列習俗、象徵為依據進行身份定性的群體，而辛亥革命發展出來的一系列現代習俗、象徵，在民國初年供社會個體在獨立狀態下自行選用和解釋；北伐之後則被國民黨灌輸進了它自身的黨義，而且社會個體在選用和解釋這些象徵時都失去了選擇的自主性。儘管沈艾娣在結論中強調「民國早期興起的中國國家認同感，是政治結構和政治力量的產物」，但從貫穿全書的上述這條邏輯鏈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儀式和典禮（儘管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結構和政治力量控制）對民國市民意識的建構作用。這不禁令人想要提出一個問題：到底是受到政治結構和政治力量控制的儀式與典禮建構了民國的市民意識，還是政治結構和政治力量所構建的民國市民意識在儀式與典禮中得到了體現？沈艾娣的研究似乎忽略了對後一種可能性的充份考慮。

胡雪蓮  
中山大學歷史系